

中國人民大學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一年

論蘇維埃經濟制度中的貨幣與交換

論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貨幣與交換

阿·特·斯拉著

董世業 趙克成譯

中國人民大學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

論蘇維埃經濟制度
的貨幣與交換

本校教材

著者 阿特拉斯

譯者 董世業 趙克成

出版者 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 中國人民大學印廠

非賣品

版初日五十二月七年一五九一
版再印重日二十月九年一五九一

I: 1500+105+100

II: 1800+5+500

論蘇維埃經濟制度中的貨幣與交換

蘇聯的貨幣與財政制度，在組織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無論平時或戰時）中，都起着重大的作用。蘇聯的貨幣與財政制度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中，經過了嚴重的考驗。法西斯德國使幾乎整個歐洲的經濟資源爲其軍事生產而服務，背信棄義地進犯蘇聯。它在戰爭開始後的頭兩年中，顯然具有比戰前更廣泛的經濟基礎，因而也就有了財政基礎。可是，蘇聯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地區被德國暫時佔領的結果，則不得不在現有的經濟基礎上去擴充其武裝力量，去加強向前綫供給武器、彈藥及糧秣。

在短短的期間內能將國家整個經濟改組成戰時體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與蘇聯後方勞動人民的果敢精神，保證蘇聯在反抗希特勒德國的鬥爭中，獲得了經濟的勝利。

戰爭招致了經濟與財政上的嚴重困難。因此便有了產生這樣錯誤見解的危險：輕視貨幣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這種見解認爲爲了前綫應該實行不擇手段的開支，因而成本問題、貨

幣經濟及財政紀律，在戰時就好像失去了意義似的。

以列寧、斯大林學說所武裝起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剛一開始就會指出：經濟機構的正確財政組織與質量指標、成本及積累等計劃的執行，這兩件事在戰爭條件下所具有的意義，比平時不但未曾稍減反而日益增大起來。

這些理論性的規定，給了實際工作者以信念、辨別力及正確方向。雖然處在嚴重的戰爭時期，但是蘇聯仍然保持了財政制度的鞏固和蘇維埃貨幣——作為經濟計劃工作與組織工作的工具，以及計算與監督的工具——的穩定。蘇聯在生產資料及按配給制度所分配的消費資料上，保持了國定價格的穩定水平。軍用品的價格在戰爭的二年半中間，由於成本降低和軍事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曾幾乎減低了三五百十億盧布，因而也減輕了戰時財政的重大負擔。

在鞏固蘇聯財政制度及蘇聯戰時貨幣的鬥爭中，十分明顯地表現了羣衆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充作國防基金及紅軍基金而捐獻的貨幣（以貴重品和農產物所捐獻的除外），在二年半中間已達一百三十億盧布，靠發行公債及彩票所得的貨幣有三百八十六億盧布，總計共有五百一十六億盧布。而每年軍事費，譬如一九四二年，為一千零八十四億盧布。靠工人、工程師及經理人員在生產上的貨幣節約，城鄉勞動者在消費預算上的節約，以及把節約下來的這些資金動員到國庫中的這些辦法，使蘇聯得以充分而不間斷地籌措了龐大的軍事費。

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間，遭遇了巨大的經濟紊亂：紊亂狀態一年一年地厲害起來，到了最後，終於釀成一九一七年的極其尖銳的財政危機。蘇聯不但順利地克服了戰爭開始後頭二年中所出現的財政困難，而且其財政貨幣制度，尚在戰爭期中，即已達到了鞏固的地步。例如，集體農莊市場價格從一九四三年一月起大約減低了一半的這一事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歷史經驗證明：在戰爭終了後，因向和平軌道改組經濟，一定要產生一種非同尋常的、極端的財政困難。在戰爭接近勝利的今日（指一九四四年而言——譯註），固然具有和協而健全的戰時經濟和鞏固的財政制度。但在蘇聯戰後轉向和平經濟軌道的過程中，也將發生各種重大而複雜的經濟財政問題。因此，我們在最後粉碎法西斯德國的前夜，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交換和貨幣的理論，乃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研究蘇維埃貨幣的發生，必須闡明這一資產階級經濟中的重要範疇在蘇聯所發生的根本變化過程，即：使它為蘇聯的經濟制度而服務的過程。

列寧曾寫道，工人階級專政可能而且必須『把一切新的和舊的形式實行改造，加以掌握，使其為自己服務，——這不是為了適應舊的，而是為了能够把一切新的和舊的、各色各樣形

是把這一承自資產階級社會的舊形式——貨幣，『實行改造，加以掌握，而使其服從』自己的任務。

土地、大工業、運輸業及銀行的國有化，破壞了『貨幣權威』，根本改變了它的作用，限制了它那作為普遍等價物的機能範圍。因為已經不許購買土地、工廠、鐵路，所以貨幣也就不同於以往而失其為從前那種意義上的普遍等價物了。同時，貨幣並開始獲得了新的內容、新的使命和新的機能範圍。

自從我國十月革命那時起，如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我們已在自己的生產方式上有組織地開始了偉大的改革。革命性的改造在分配及流通——如國家銀行的佔有，私人銀行的國有化，資本市場的消滅等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就使蘇維埃國家可能利用貨幣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中的基本任務。

在蘇維埃國家剛一成立的時候，就建立了——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的財政制度，組織了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銀行，實行了對外貿易的壟斷和通貨的壟斷。由於佔有了經濟統治地位，結果便產生了一種新的、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貨幣流通條件，產生了貨幣政策

的新任務，發現了實現新任務之新的手段和方法。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特別類型的貨幣——

列寧曾經強調說，假如我們沒有財政政策的成功，假如我們不能恢復貨幣制度的話，那末，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註定要失敗的』。

蘇維埃國家的貨幣及財政的政策，自從剛一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起，就採取了這樣的路綫：恢復貨幣的流通，並為恢復工業及農業與加強社會主義成份在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中的地位而創造一種管理貨幣經濟的槓桿。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是公認市場的存在和貨幣的流通，並過渡到農村小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生產品與社會主義國營工業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品的廣泛交換。列寧很早就指出了：市場存在和貨幣流通的合法化過程，雖然是迅速恢復農業及工業所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任其自流：必須對它加以綿密的研究並使其接受國家的管制，以便防止社會主義成份被市場及貨幣流通的盲目力量所左右。需要規定這些盲目力量之作用的限度並有意識地利用它們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當時，鞏固蘇維埃盧布乃是一個極重要的任務。如果沒有穩定的蘇維埃貨幣，那就要使計

等系亦因白米等價漲而漲。月明系之關係在自蘇聯之系中言等。長金名譽與名白。百上七不可能得出實在價值變動的確實情況。一九二二年，工農監督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及蘇聯勞動國防會議所實行的許多調查暴露了下一事實，即：托辣斯並不了解其生產品的實際成本，因而也就多半是糊裏糊塗地工作。後來按照列寧的指示，才開始用穩定價格來計算，也就是不論自由市價或公定市價，都用指數和黃金來計算了。這時期經濟週轉中已經存在着兩種平行的價格，即用黃金計算的價格及用紙幣計算的價格。爲表明它們中間的關係，又規定了蘇維埃紙幣對黃金的行市。

這就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中貨幣流通的實際情況。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關於經濟工作問題的指示中指出：需要『恢復以金本位爲基礎的正當貨幣流通』[●]。該大會通過了人民委員會關於限制紙幣發行所作的決議，並批准了按黃金計算的國家預算。

自從新經濟政策開始，便表現出那時價值構成的特點。當時的條件是：經濟的最高管制權操之於特殊類型的國家——蘇維埃國家掌中，而基本的工業商品的生產又爲國家所壟斷。在零售商品交易方面，基本上還掌握在私商人——耐潑曼手中。但是列寧早在一九二二年即已指

出：『爾後是對於價格上不可能有其獨自的影響，因為它不是生產者的緣故』^①。所有的大工業，從而絕大多數的工廠產品，實際者都有蘇聯影響，於是這個不可削弱的市場及價格的調整問題。

當時，價格的調整既促進了恢復國營工業所需積累的速度，又保證了經濟之有計劃的發展，更刺激了農業的增長。同時，實行價格調整也是爲了穩定貨幣及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的積累。由此可見，早在那一時期就根本改變了蘇聯貨幣的機能，並把那作爲價值尺度及流通工具的機能加以改變了。

但是，那一時期蘇維埃貨幣，無論在生產方面或者在流通方面也會被資本主義成份所利用，因爲當時它們仍佔有着一部分剩餘生產品，它們的貨幣積累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因此，無論在貨幣上或貨幣流通上，都能看到新經濟政策的二重性和矛盾的表現。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結束語中，天才地闡明了新經濟政策的二重性和處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及過渡期環境中之經濟發展的辯證法。而在過渡時期中，資產階級的方法及武器是被社會主義成份用來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並築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的。

斯大林同志說道：『問題是在於，因爲我們有了發展的辯證法，所以資產階級這些工具的

作用與價值俱有別具」根本已過時了，還得重新於社會主義，有另於資本主義了」。

這一理論上的命題，乃是恢復期中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經驗的深刻總結。同時，它在蘇聯經濟政策上，特別是在今後各年間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上，給以決定方向的力量。

在恢復時期一九二四年的貨幣改革中，極明顯地表現出了蘇維埃貨幣的特性。當時，蘇聯只有少量的黃金儲備而且沒有外國信貸，因此它不能單純利用在市場上參加承兌的辦法（按定價拋售黃金及外幣）來穩定貨幣。蘇維埃國家主要是用商品調劑的辦法，亦即按照穩定價格向市場拋售國家大量商品的辦法，而獲致了貨幣的穩定。由此可見，國家爲了保證貨幣的穩定，在那時就已經廣泛地利用過大量商品。蘇維埃貨幣的特性以及在實施幣改時所具有的勝於其他國家的許多優點，正表現在這裏。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期中，曾經發生過動員黃金及外幣準備來彌補由於工業輸入而發生的各項消耗的嚴重問題。及至由於貨幣改革而貨幣購買力已趨穩定的時候，蘇維埃國家便停止了參加承兌的工作。這一時期，國內及國外的切爾達茨市場（交易）時價已被廢止，而實際上就是消滅了國內的貨幣市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中間，曾禁止蘇維埃貨幣的輸出和輸入。所有這些都是說明黃金和外幣已不准在國內經濟週轉中流通了。

這樣便完全實現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後幣制改革的指示。

馬克思寫道：「……國家銀行將代替一切私人銀行而出現，其紙幣則具有法定的市價。」

這種措施使調整整個信貸事業以利全體人民的工作成爲可能，並以此摧毀大批貨幣所有者
自來水。甚至到會消滅了金銀之貨，這和打倒信貸信貸是附屬自必更自必更」——
普遍交換手段——貶值，並可把金銀用到對外關係上去」●。

馬克思及恩格斯天才地預見到了信貸貨幣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推斷說，在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以後，貨幣必須存在的條件以及商品、信貸、銀行、及其他資本主義經濟之工具的存在條件，也都將消滅了。馬克思曾推斷說，在社會主義下社會勞動的計算及勞動生產品的分配，都將直接以勞動時間單位來實行●。

對於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預斷，我們不可加以教條主義的解釋。真正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需要總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經驗，如斯大林同志所說，以便『依據於這個經驗，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

●馬恩全集，第五卷，俄文版，第五八六頁。

●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六年版，俄文版，第二卷，第三〇三——三一〇頁。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第七八三頁。

斯大林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商業、貨幣及價值法則的指示，是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經驗的深奧科學總結為基礎的。這些指示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創作，並把馬克思、列寧的經濟理論推向前進而使它豐富起來。這些指示在研究蘇維埃貨幣的發生、分析其性質及機能、以及研究社會主義中貨幣流通的規律性等方面，用必須的科學方法論把我們武裝起來。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一原則不但保證了勞動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協和一致，即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上，也有着重大的意義。但為實現這一原則，則需要對勞動尺度及消費尺度進行最嚴格的社會監督^①。作為這種監督工具來說，是需要利用貨幣的，尤其當非社會化部門中以及社會化部門與非社會化部門間還需要繼續實行貨幣交換的今日，更屬必要。

在結構複雜的經濟情況下，對整個國民經濟所進行的計劃性領導的統一，要求着統一的經濟聯系形式即貨幣商品的形式。

無論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份中，或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的年份中，蘇維埃貨幣都繼續完成了它的機能，幫助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顯然，個體農民經濟之變為集體經濟，雖然改變了交換的性質，但它並未消除工業與農業間之商品及價值關係的必要性以及交換與貨幣的必要性。而且，利用貨幣及商業來進行社會主義統計、進行計劃工作，以及管制與組織國營企業經濟週轉等歷來所蓄積下來的經驗，證明了貨幣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也證明了它具有適於社會主義經濟條件的可能性。

關於貨幣、商業及信貸之左派的『消失論』，在客觀上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害處。這些『理論』掩蔽了對一九三〇年信貸改革原則的肆意歪曲，鼓舞了紙幣的超計劃發行，傳播了輕視貨幣計算及監督與減低產品成本的看法，鼓舞所謂『自動的』貨幣核算而破壞了經濟核算的真正基礎。十分顯然的，這些『理論』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各色敵人所捏造出來的東西。

黨無情地揭露了消滅貨幣的『理論』，消滅了對貨幣流通、信貸、財政及經濟核算等實際工作的曲解。

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說明了：在社會主義期間，不僅在加強城鄉的結合上，在工業與農業間的交換上，需要貨幣，即作為實現按勞付酬之社會主義原則的方式和作為組織社會主義工業內部之經濟聯系的方式，也是無一不在需要貨幣的。

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中之所以需要價值、交換及貨幣，是因為社會主義中社會勞動的特殊性及社會勞動分工之性質的緣故。

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性質有着極其顯著的差異。如果忽視了這些差異，那就將在理論和實

際上產生有害而不可容忍的工資平均主義。我國工資的政策是在於按照勞動的數量與質量盡可能更深刻地、更詳細地和更具體地來區別勞動報酬。因此，若只按所完成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數來給勞動報酬的話，則違背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在性質上具有的差異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

在社會勞動存有質量差異的情形下，貨幣報酬的必要性是與分配過程的特殊性相關聯着的，換言之，也就是因為必須由社會總產品中分出個人消費基金並將此基金分配給勞動者，從而也就產生了貨幣報酬的必要性。

使用貨幣不僅是由於實行各項計算與支付勞動報酬，而且也是由於社會主義中社會生產的一切組織制度的需要。經驗證明：不論是各個企業範圍內或是在整個國營工業範圍內，其組織性質及計劃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

對於企業，可能而且必須把它這樣組織起來：使它像一部精確的鐘表機構一樣，協調地有節奏地工作，使主腦部分能够直接管理這一機構中每個螺絲釘的動作，並在工作當中克服各種不正常的現象。

但在另一方面，不論是某一統一的中央工業機關或是這些機關的整體，都不能把工廠內部的人員及機械的配置、企業的協同生產、以及各企業間的成品、半製品與原料的週轉等等詳細地規定出來。各管理局、各托辣斯與各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範圍內，應有其業務上的獨

托辣斯及管理局按照計劃及指令本着合同的方式來規定。因此，企業在一定限度內應以獨立經濟單位而出現。

爲使各企業的再生產過程連續不斷，就需要補充生產中的各項消耗；爲了擴大再生產，不僅需要補充這些消耗，而且也必須容許企業處理其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一部分積累。只有在各企業間採取以勞動生產品所進行價值交換原則或方式，才能保證各項消耗（包括活勞動的報酬——工資——在內）的補充，並保證每個企業在其把自己生產品與其他企業勞動生產品相交換的過程中直接獲得積累。社會主義國家就是通過價值的方式來監督與檢查，這些消耗的水平，並根據其贏利性及積累的水平來決定每個企業的工作成果。

爲使交換成爲真正的交換，應當承認每個企業都有其充作生產及再生產之用的社會基金份額。各企業及經濟機關的『自有資金』這一特殊範疇即由此而來，它是交給各企業、各經濟機關處理並用以完成其計劃任務和將其生產品換成其他企業勞動生產品的資金。

經過改造的價值交換原則（國家所計劃的交換），乃是目前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社會主義工業機關的基礎。

社會主義企業間所進行之勞動生產品的交換，目的在於把各種生產品變爲特種商品——社會主義企業的商品。這種具有發展與普遍之形態的交換，必然要產生對貨幣的需要。因此，價

值、商品、交換及貨幣等範疇的必要性，也就隨着社會主義工業中生產品移動及社會勞動組織的條件而產生了。

分散在各企業各經濟部門及各地區的直接社會勞動，其聯系（由國民經濟計劃所調整的）與統一，通過交換、價格及貨幣而實現出來。

實際說來，也只有通過這些方式，國家才能對勞動尺度及消費尺度實現其伸縮自如的經常監督制度。此處所談的監督，並不只限於對各個工作者的勞動和個人消費——即對工資組織的監督，它也包括着對生產性消費的管制。對生產性消費的管制是根據我們現行的原則來實現的，即視企業對其產量計劃與消費水平計劃（計劃成本）的完成程度如何來滿足企業的資金需要。

如果違反了標準定額，該企業就要發生交換不利及資金不足的現象。這樣，企業爲了保證繼續再生產便不得不請求追加資金，從而也就暴露出來它的落後或浪費。

在合作社集體農莊財產佔統治地位的農業中，其生產手段是歸該集體農莊全體所有的。因爲合作社集體農莊的企業不是孤立而隔絕的經濟單位，故其在生產手段及勞動生產品上的權利，只有經過交換才會實現出來。由此可見，發展形態之交換的必要，從而貨幣的必要，也是從這種在農業中佔統治地位並於工業（工業合作社）中具有相當地位之合作社集體農莊財產的經濟性質中產生出來的。